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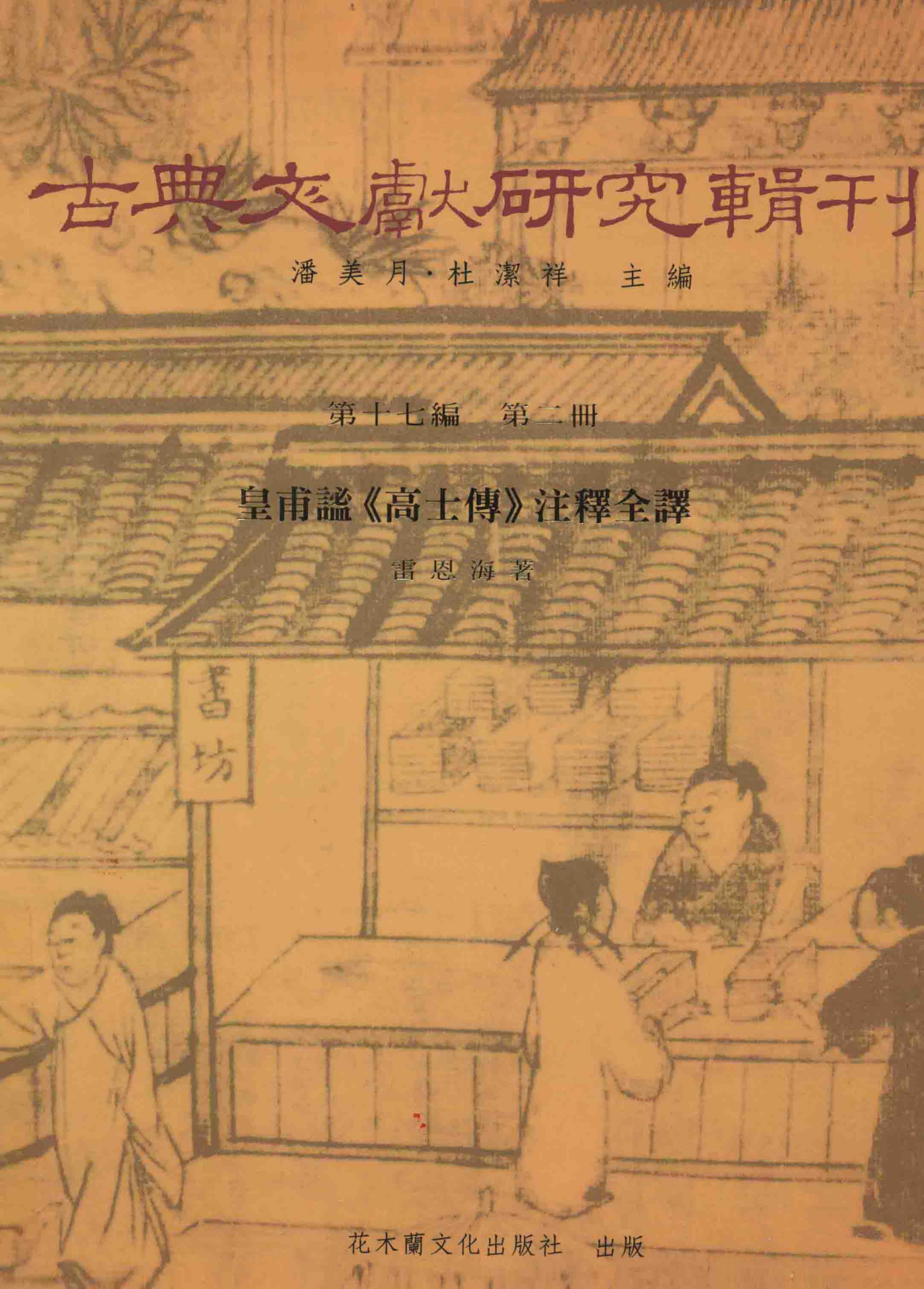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十七編 第二冊

皇甫謐《高士傳》注釋全譯

雷恩海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七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2冊

皇甫謐《高士傳》注釋全譯

雷恩海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皇甫謐《高士傳》注釋全譯／雷恩海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102〕

目 4+26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七編；第2冊）

ISBN：978-986-322-427-3（精裝）

1. 高士傳 2. 注釋

011.08

102014842

ISBN-978-986-322-427-3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七編 第二冊

ISBN：978-986-322-427-3

皇甫謐《高士傳》注釋全譯

作 者 雷恩海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9 月

定 價 十七編 20 冊（精裝）新台幣 31,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皇甫謐《高士傳》注釋全譯

雷恩海 著

作者簡介

雷恩海，1969年生，1996年考入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師從蔣凡教授，攻讀中國文學批評史，1999年畢業，獲文學博士學位；同年，入蘇州大學博士後流動站，在嚴迪昌教授的指導下，研治中國詩學，2001年出站。現為蘭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的教學與研究。

提 要

皇甫謐乃魏晉之際著名隱士、學者、文學家，一生勤學不怠，博綜典籍，無不通曉，勤於著述；精通醫學，乃中華針灸學的奠基者，有《針灸甲乙經》等傳世。皇甫謐篤於道義，守道自持，不徼聲名，不慕勢利，淡泊從容，謙退廉讓，希慕隱逸高士，認為高讓之士，王政所先，承擔著厲濁揚貪之務，故而收拾前代遺文，採錄近世，作《高士傳》，期望影響於社會風尚。

《高士傳》版本流傳，情況較為複雜，在流傳過程中屢有分合竄亂，已不可詳究。此次整理，以《叢書集成初編》本所收吳琯《古今逸史》本為底本，參考眾本，擇善而從。清人錢熙祚及近人王仁俊、羅振玉等皆曾輯其佚文，此次亦重新訂正，並按時代次序排列，以與正文條目一致。注釋，重在解釋典章名物、地名，以及一些重要的語辭。注重將《高士傳》的文獻來源摘要錄出，以見其淵源所自。同時，彙錄散見於《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之嵇康《聖賢高士傳贊》的佚文，列於相關條目之下，並參考戴明揚《嵇康集校注》所附佚文，以期見出其時特殊的社會風尚。翻譯，則力求簡明，也注意古代漢語一些特殊的表達方式和語言習慣，以便於對原文的理解，而一般不採用意譯。之所以這樣做，目的則在於能夠提供一個有一定學術性、便於普及的本子。



目次

前 言	1
高士傳序	13
卷 上	17
被衣	17
王倪	19
齧缺	24
巢父	26
許由	28
善卷	32
子州支父	35
壤父	37
石戶之農	39
蒲衣子	40
披裘公	42
江上丈人	44
小臣稷	47
弦高	50
商容	53
老子李耳	55
庚桑楚	58
老萊子	61
林類	64
榮啓期	67
荷蕢	69
長沮桀溺	70
石門守	72
荷蓑丈人	73
陸通	75
曾參	79
顏回	80
原憲	83

卷 中	87
漢陰丈人	87
壺丘子林	90
老商氏	92
列禦寇	95
莊周	97
段干木	100
東郭順子	102
公儀潛	105
王斗	107
顏闕	109
黔婁先生	113
陳仲子	114
漁父	117
安期生	120
河上丈人	122
樂臣公	123
蓋公	124
四皓	126
黃石公	128
魯二徵士	131
田何	133
王生	135
摯峻	137
韓福	141
成公	143
安丘望之	144
宋勝之	146
張仲蔚	148
嚴遵	149
彭城老父	152
韓順	154
鄭樸	156

李弘	157
向長	159
閔貢	161
卷 下	165
王霸	165
嚴光	167
牛牢	171
東海隱者	172
梁鴻	174
高恢	178
臺佟	180
韓康	182
丘訢	184
矯慎	186
任棠	189
摯恂	191
法真	193
漢濱老父	197
徐稚	199
夏馥	202
郭太	206
申屠蟠	209
袁閔	214
姜肱	216
管寧	219
鄭玄	222
任安	226
龐公	227
姜岐	230
荀靖	232
胡昭	234
焦先	236
佚 文	239
校勘記	259

前言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自號玄晏先生，魏晉之際著名隱士、學者、散文家。生於漢獻帝建安二十年（215 年），漢太尉皇甫嵩之曾孫，安定朝那（今甘肅省靈臺縣朝那鎮）人，徙居新安（今河南澠池縣）。皇甫氏累世富貴而其家貧。皇甫謐出嗣其叔父，少年時游蕩無度，不好學，與中表梁柳等作兵家兒戲，或以爲癡。《晉書·皇甫謐傳》曰：

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

魏齊王曹芳正始末，得風痺之疾，猶手不輟卷，耽玩典籍，廢寢忘食，時人謂之「書淫」。有人勸誡過於勤奮，將損耗精神，皇甫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遂不改其初衷。皇甫謐四十歲時，歸還本宗。魏末，郡召上計掾，舉孝廉，相國司馬昭徵辟，皆不就應命。司馬炎代魏，屢下詔徵辟之，又舉賢良方正，鄉親勸其應命，皇甫謐作《釋勸論》，又上疏自陳，言辭切至，晉武帝不奪其志。皇甫謐一生勤學不怠，《晉書》本傳說：「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患，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皇

甫謐聲名甚高，謙退廉讓，持身有道，「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沉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守志以終，卒於太康三年（公元 282 年），時年六十八。

皇甫謐力學不怠，博綜典籍，無不通曉，且勤於著述，《晉書》本傳說：「謐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曆》、《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有集二卷，已佚，今存文十三篇，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詩殘篇二，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皇甫謐爲一代名士，其爲人篤於道義，守道自持，不徼聲名，不慕勢利，淡泊從容，謙退廉讓。或勸皇甫謐廣修聲名，廣事交遊，以「時譽」而入仕宦，皇甫謐清節自守，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並做《玄守論》以答之。其中表兄梁柳乃幼時夥伴，梁柳出任城陽太守，或勸皇甫謐賤之，皇甫謐說：「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晉書·皇甫謐傳》）沈靜寡欲，玄默自守，其行事大抵如此。而《玄守論》則可以視爲皇甫謐守道隱居的直接表白，有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主張玄默自守，遺棄物質、聲名之累，而游心於太玄，獲得精神的自由。在《釋勸論》中，更直接表示了對隱逸高士的仰慕之情：

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遁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諡於布衾；干木偃自以存魏，荊菜志邁於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

因自身的玄默自守、謙退廉讓，希慕隱逸高士，皇甫謐遂收拾前代遺文，

採錄近世，作《高士傳》，以期傳之久遠。可謂性之所近，有爲而作。皇甫謐《高士傳序》說「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且進而陳述儒家的「束帛之義」、「玄纁之制」，認為「高讓之士，王政所先」，承擔著「厲濁揚貪之務」，期望影響於社會風氣，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因此，皇甫謐對高讓之士，傾注了深厚的情感——「夫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稱其德而贊其事哉」；在傳述高讓之士時，表達了皇甫氏自身玄默自守的思想和高潔情操。

其實，玄默自持、守道不改的高士，在魏晉之際深受讚賞，是有著深刻的現實背景的。西漢末年以來，政權的更疊、官場的傾軋以及社會風氣的卑濁，致使奔競趨勢之徒夤緣際會，僥倖仕進，如：

陽球奏罷鴻都文學畫像疏曰：「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皆出於微賤，附托權豪，或獻賦一篇，或烏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是以有識掩口。臣聞圖像之設，以昭勸誡，未有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妄竊天官，垂像圖素者也。」可見曳白之徒，倩買文字，僥倖仕進，漢時已然，毋怪後世士風之愈趨愈下也。（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五）

在此情形下，一些正直之士遂產生了逃避仕宦、全身遠害的思想，同時也有意識地採取了與世俗社會相對立的態度和行爲，其積極者則期望以自己的處世態度、風節操守而影響於世。兩漢時期，對士人影響甚大者乃黨錮之禍。《後漢書·黨錮列傳》說：「至王莽專僞，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紱，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而士人以清議而譏評時政，針砭當權者，其議論所及，傾動一時，「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就其實質，乃外廷士大夫與內閹宦寺的鬥爭，勢同水火，最終導致了權倖、宦寺的迫害而禍及士林。黨人之名，書於王府，正直放廢，邪枉熾結，「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後漢書·黨錮列傳》）。對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甚大，而黨錮之禍，實乃釀成東漢敗亡之一重要原因。

處此動輒得咎、不可爲之時，士人各以其性之所近，選擇出處進退之方

——「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此一行爲，或以爲近於沽名釣譽，其實有著根本的區別，「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

（《後漢書·逸民列傳》）黜勢力而崇節義，對社會風氣的淨化，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及至漢末魏晉之際，尚詐力而貶節義，士人之無行者，朝秦而暮楚，依附於勢要，致使士風日益衰頹。而一些入於仕途的名士，守道自持，往往死於權力紛爭之中。

從思想領域而言，漢初重黃老之學，主張清靜不擾，使民得以各安其生；武帝以後重儒學，儒學篤於君臣之義，而儒家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以樸素的原始民本思想，頗爲重視士人的個體精神的獨立；自魏晉始，宗奉老、莊，其宗旨爲委心任運。這一背景，有利於玄默自守、謙退廉讓思想的生成，因此高讓之士大得時譽，爲時人所稱賞。

此外，自漢武帝獨尊儒學以來，經過歷代君主的提倡，儒學已經深入世人的心靈深處，所倡導的君臣之義，對世風有著深遠的影響。《後漢書·儒林列傳》論曰：

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

即使至於衰頹之時，豪強並起，亦能秉大義而識進退之宜，所謂

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闖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

甚至如曹操功蓋天下，雖挾天子以令諸侯，而不敢公然行叛逆之事。「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兩漢數百年作爲意識形態主流的儒學教育，形成了士人篤於君臣之義的思維、心理定勢，當政治形勢發生變化、君臣之義遭到破

壞之時，世風丕轉，遭遇了新一輪的「禮崩樂壞」，新舊道德並存，士人面臨著新的道德價值取向、出處抉擇，而固有的操守節義就易於成為評判士人的一個重要標準，也是療救奔競之風的一劑良藥。

在政治權力角逐中，曹操以法術治世，而倡導「唯才是舉」，賤守節而籠絡人才，培植勢力，這一舉措對社會風氣之影響甚大且甚為深遠。當西晉立國之初，為改變一時風氣，創建一新的道德風尚，傅玄倡言舉薦「清遠有禮之臣」，而探討社會風氣敗亂之源，不得不歸於曹魏肇基之時，《晉書·傅玄傳》曰：

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

傅玄所論，止於曹魏，而司馬氏之詭詐、粗鄙，過之而無不及，對固有社會風氣之摧敗更甚。至魏之中朝，司馬氏以武人之粗豪、鄙陋、狡黠，而不顧義理，破壞君臣之義，以詐力而謀取天下，且往往不擇手段。《世說新語·尤悔》曰：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迺具敘宣王（司馬懿）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司馬昭）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唐修《晉書》，將此條採入《宣帝紀》，作為信史流傳：「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士人處此風雲際會之時，奔競之徒以為康莊，利欲熏心者志在必得，這一行徑對社會風氣影響甚大，形成了浮躁趨勢的奔競之風。此一趨勢、阿容之風，延續至於有晉，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性靜退不競的潘尼作《安身論》，論述士風之頹敗曰：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

行必由於正。……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憂患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眾欲並爭，群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歡；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駕蹇希奔放之迹，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沓，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強，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晉書·潘尼傳》）

並且歸結於漢末以來士風的頹衰，而愈演愈烈。故而潘尼要求「今之士人」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以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晉書·潘尼傳》），如此才能安身立命。於是，潘尼遂倡導謙退廉讓、玄默自守處世之道。雖然如此，西晉之風氣並未改變，干寶《晉紀總論》曰：

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宣、景（司馬懿、司馬師）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曹芳）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曹髦）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文選》卷四九）

可以說，有晉之社會風氣之頹敗達於極致，其肇亂之源實在於司馬氏以詐力篡奪天下，任用趨勢奔競之徒，而導致的士風的衰敗。

士人處此道義崩頹、動蕩戰亂之時，倡導玄默自守、謙退廉讓，而希慕

隱逸高士，遂有了針砭現實、重新建樹道德風尚的意義。因此，西州高士皇甫謐守道自持，謙退廉讓，作《高士傳》，顯揚逸民、高士的處世態度、風操節概，實有其現實意義。其實，與皇甫謐同時的嵇康也作有《高士傳》。

《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裴松之注引嵇喜《嵇康傳》曰：

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得志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於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晉書·嵇康傳》亦曰：「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嵇康率然玄遠的高情遠趣，除其性之所秉而外，更多地與曹魏之時尖銳的政治鬥爭相關。《晉書》本傳曰：「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為曹操之孫曹林婿。時司馬氏與曹氏爭奪政權，嵇康性烈而才俊，以宗室姻親，心向皇室，拒絕與司馬氏的合作，每非湯武而薄周孔，被司馬昭尋釁所殺。嵇康作《養生論》，暢論其「任自然」的思想：

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

此乃「和理日濟，同乎大順」，反之，「仁義務於禮偽，非真之要術；廉謙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在《釋私論》中暢論曰：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為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

嵇康公然宣稱「君子行道，忘其身矣」，因為，「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

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倘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嵇康主張率性任真，以思想的鋒芒來反對司馬氏的專制，針鋒相對地以「自然」來對抗司馬氏的「名教」，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而歷史上的隱逸之人、高讓之士，遁心逸名，實乃「任自然」之傑出代表，故闡揚之，表彰他們「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的玄默自守的風節，以此來批判向風趨勢者的無節操、媚世取容，從而形成對司馬氏集團的離心力。對此，司馬氏的理論家鍾會是有著深刻的認識的，《世說新語·雅量》劉孝標注引《文士傳》曰：

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

《晉書》鍾會本傳亦說：「適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與。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鍾會認識到了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崇尚高讓之士，其本質在於輕時傲世，不爲物用，顯揚高士的處世態度、風操節概，建樹士人獨立的人格品性，而不趨避、依附於勢要權力；在曹魏與司馬氏鬥爭尖銳之時，這一主張是有著強勁的離心力的，揭穿了司馬氏所倡導的「名教」的虛偽。嵇康《高士傳》「自混沌至於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表彰隱逸高士的特立獨行，闡揚其不事王侯、輕時傲世的獨立人格，是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的。

身處魏晉易代之際，無論是嵇康還是皇甫謐，其《高士傳》都有著針砭現實、建樹道德風尚的積極作用〔註1〕。張宗泰所作皇甫謐《高士傳》跋文

〔註1〕皇甫謐《高士傳》似作于入晉以後。嵇康生於魏文帝黃初五年（224年），卒于元帝景元四年（263年），時年四十，而兩年後（即泰始元年，265年），司馬炎代魏，建立晉朝。而皇甫謐生於漢獻帝建安二十年（215年），年長於嵇康九歲，卒于太康三年（282年），于嵇康被殺二十年後方辭世。皇甫謐《高士傳序》說「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而傳中最後一個人物焦先，「或言生漢末」，「後百餘歲卒」，則皇甫謐親聞焦先之卒。焦先「少避白波」，而靈帝劉宏中平五年（188年）二月，黃巾余部郭泰在白波谷起義。焦先縱未至百歲，然必高壽，自漢末至晉，方足百齡。可證皇甫謐作《高士傳》在入晉以後。此其一。其二，《三國志·魏書·管寧傳》附《胡昭傳》裴松之注引《高士傳》

曰：「其書大旨薄視富貴，崇獎節義，喜言恬退，不尚進取，雖不盡合於聖賢中正之道，然以救人世奔競之風，則一副清涼散也。惟是堯讓天下於舜，舜讓天下於禹，此夫人而知之者，乃云堯讓天下於許由，又讓於子州支父，舜讓天下於善卷，又讓於子州支父，又讓於石戶之農及蒲衣子，何多讓也，將毋藉以寫高士襟期，故曼延其說歟？」（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卷一九引）「寫高士襟懷」、「薄視富貴，崇獎節義」、「救人世奔競之風」，張宗泰窺見了此書的本質所在。

如此看來，高讓之士在魏晉之際受到重視，也就不是偶然的。而《高士傳》的撰述，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必然產物，反映了一部份士人建樹道德風尚的努力。皇甫謐《高士傳序》說：「謐採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此書自產生之後，就受到了世人的重視。擬作者甚多，《隋書·經籍志》著錄嵇康撰、周續之注《聖賢高士傳》三卷，皇甫謐《高士傳》六卷、《逸士傳》一卷外，尚有：

《逸民傳》七卷，張顯撰。《高士傳》二卷，虞盤佐撰。《至人高士傳贊》二卷，晉廷尉卿孫綽撰。《高隱傳》十卷，阮孝緒撰。《高隱傳》十卷，虞孝敬撰……《續高士傳》七卷，周弘讓撰。

而《舊唐書·經籍志》又著錄袁淑《真隱傳》二卷。自魏晉至南朝，撰述高隱，成為一時盛事。此後作者代不乏人，其有高名者，如明皇甫濂《逸民傳》二卷，「是編採歷代逸民事迹，人各為傳，起晉孫登，訖宋林逋，凡百人。」潘京南撰《衡門晤語》六卷，「是編摘錄古今隱逸閒適之事，分前、後、續、別四集。前集廣成子而下七十五人，自上古逮魏；後集孫登而下七十五人，自晉逮元；續集伯成子高而下百五十人；別集則撫其議論及所作詩

曰：「初，晉宣帝為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陟險，邀生於崕、澠之間。」胡昭卒于嘉平初年，嘉平凡六年，則胡昭卒年當在嘉平二年（250年）前後。又引《高士傳》「焦先」條曰：「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為大賢。」稱宣帝、景帝，必為入晉後。其三，《晉書·皇甫謐傳》說「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稱草莽臣」，堅守不仕，「謐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余，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朝廷屢屢征舉，皇甫謐篤志不仕，很可能於此時作《高士傳》以自娛、明志，且顯揚玄默自守、謙退廉讓的清節，以期影響于世風。綜上可證，《高士傳》乃皇甫謐入晉以後所作，為其晚年著作。